

世纪留韵——纪念恩师伏文彦诞辰105周年

■蔡海平

今年8月16日是恩师伏文彦诞辰105周年纪念日，缅怀先生的一生如谦谦君子、虚静淡定，他的艺术人生值得我们永恒怀念。

1920年8月先生出生于上海高昌庙，祖籍河北任丘。祖父、伯父喜好书画，幼承庭训，耽于绘画。念初中时父亲为他聘请家庭教师，兼学《四书》、古典诗词，临柳公权字，因为爱好绘画，18岁考入了上海新华艺专，学习中西绘画和音乐，师承汪亚尘、汪声远、唐云、来楚生等，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教授中国画。后列为汪亚尘入室弟子。23岁执教上海中国艺术大学，并开始在大新公司四楼展厅展售作品。26岁时绘画作品即与唐云、陆抑非等并列展出。其名被列入1947版《中国美术年鉴》。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会长。移居美国后，为美国纽约美术家协会高级顾问，美国张大千书画研究会会长。2021年11月7日在美国旧金山仙逝。

1946年，张大千在上海开书画展，伏文彦每日往观，为之倾倒，决定拜张大千为师，并得到了老师汪亚尘的同意和父母的支持。当时张大千来沪都是住在卡得路(今石门二路)李秋君的瓯湘馆，并在李家设坛收徒。拜师当日，伏文彦走在红地毯上向张大千首先递上门生帖，然后奉上一段张大千喜欢的长衫毛料和一箱墨膏作为拜师礼，燃上大红蜡烛，伏文彦和妻子李璞如双双向张大千行三磕头礼，见证者有李祖韩、李秋君、陈巨来、汪亚尘以及大千先生的其他朋友。拜师后更加勤奋，每逢周日，其必到旧书店、裱画铺、古玩市场去买画册、观看古今书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张大千绘画精品迭出，伏文彦幸有如此得天独厚的

条件，近距离地接受大千老师的熏陶，体会他的画法、画理、画境，如是三年，深得大千绘画三昧，画艺由此猛进。曾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筹备上海中国画院的人选档案中，由画院副院长贺天健先生提名举荐其为画院助理画师侯选入之一。

先生是传统中国画笔墨与新派传统山水画风风格体系的坚定继承者与守护者，这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是非常不易的。表现在他的绘画中，即是在融合诸家基础上对经典山水画审美格调与笔墨程式的坚持与渐进式的转换，而青绿山水正是他实现这一坚持与转换的主要绘画样式。

其早期山水画，受汪声远等的影响，起步于对石谿、石涛的追摹，并上溯到元朝等山水画大家，以兼工带写或淡青绿山水为主，多作山林隐逸一类题材。后受张大千指点，开始系统地上追宋元，从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直至“元四家”皆有临习，逐渐走上了以赵孟頫、王蒙苍浑秀润一路画风为主调。且绘画经历了当年新华艺专的系统学习，又亲炙于张大千，转益多师，从临摹入手取古人之心，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表现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伏文彦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为传播民族绘画艺术孜孜矻矻。早年他在上海教育局美术中心站任职，培训中小学图画老师，曾先后应邀在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上海老干部大学等院校教授中国画。其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画家，教学中除了亲自示范绘画技法外，根据需要还穿插一些画史、画论方面的讲解。他总是要求同学们取法乎上，强调需结合古代绘画的代表人物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的作品上多下功夫，同学们收获良多。伏文彦宽厚待人，教学以鼓励为主，

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像父亲又像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他遍游名山大川，黄山、雁荡山、武夷山、崂山、峨眉山、青城山、乐山、富春江均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处，通过写生或观察大自然，眼界大为开阔，心境亦为之改变，题材和构图有了较大变化，笔墨也随之开始突破早年的法度，而显现出灵动秀润的清朗气息。他曾以93岁的高龄在美国旧金山创作6米余的《黄山揽胜图》长卷，画面境界开阔，大有咫尺千里。陈佩秋读后欣然为之题曰：“文彦先生黄山图卷，云海奇峰尽收笔底，盖奇观矣。黄山奇，画笔亦奇。以文彦先生为大千先生高足，有名师指导自然不同凡响，是以能破出窠臼，别开新意，则此图之可珍藏也。”

青绿山水是伏文彦绘画的一大特色，其继承南宋“二赵”一脉，并自成家法，构图缜密，设色典雅，渲染恰到好处，功力至深。著名美术史论家丁羲元说：“在青绿山水的造詣方面，伏先生绝对是一把好手。”与老师相交近半个世纪的谢稚柳在《伏文彦画集》序言中说：“文彦遍游名山大川，师法造化之奇奥、烟云之变幻，每抒新意，别立风格，大风堂弟子中文彦能以大千之笔法作自己的画，诚乃活学大千者。”

1989年，伏文彦移居美国旧金山，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依然为弘扬祖国的绘画艺术尽心竭力。初到美国时，他就应邀在旧金山中国城“女青年会”讲授中国画。伏文彦说：“绘画创新要讲民族性、独特性、艺术性，借作品表现作者的思想 and 精神，提倡风骨俊朗，反对泥古不化和恶俗习气，这样才会繁荣我们的创作。”说到艺术评论，则主张：“最好开门见山，不要隔靴搔痒，客观地评论画家及其作品，力求摒弃过多的主观性。”他在90岁以后还多次在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演讲，将祖国



伏文彦摹张大千课徒稿

的传统绘画艺术传播到异国他乡，把张大千的艺术人生介绍给中外人士。

恩师旅居海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看书、写字、画画、会友，有时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利用一切机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绘画艺术，他已经超越一切物质的羁绊，只求精神上的满足。苏东坡有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老人家自称“金山大隐”，友人都为他惋惜，劝他出山回国，他却一笑了之，自得其乐，正是以这种心态过着恬淡而愉快的生活。

千佛崖已过千年

■黄阿忠

沿四川广元的嘉陵江走，出城十多公里便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的北魏时期的千佛崖。

千佛崖位于穿广元城而过的嘉陵江边，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石窟群。那些窟龕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唐代建造者为最多，宋代陆续有增建。多少年以来，几代工匠在石壁上凿开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佛龕，从五、六十公分到三、四米大小，甚至更大的洞窟，密密麻麻，高高低低像是蜂巢一般依山形安置在石壁上。山崖高达40米，绵亘长达500余米，洞窟最多的地方往上叠有13层。山崖不是很大，那些大小不一的洞窟里，雕凿了或站立、或卧坐的菩萨，很有特色；几个较大的洞窟像是一个殿堂，站立着三、五个菩萨，虽叫不出是什么名字，但配上几个力士，以及供养人，却亦有规模。菩萨背后墙上赭红色的夹有石绿、石青色的壁画，值得让大家一看。

1935年，为抵御入侵的日寇，炸崖开筑108国道，毁掉了大约快一半的崖壁洞窟，这种毁灭历史传承的举动，无可奈何痛心疾首。

北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佛教传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全盛期，全国的庙宇是历史上最多的。晚唐诗人杜牧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莺啼”、“映红”、“水村”、“山郭”等词，营造了一种诗性的气氛，让人在烟雨中感觉到一种参禅的意境。

云岗、龙门、敦煌、麦积山等石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佛教的鼎盛时期筑造的。不管是皇帝、官员还是平民百姓，佛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山崖开凿的石穴、洞窟是他们进行寄托精神、安顿灵魂的一系列活动的场所。宗教产生了寻找各种依托和排遣寂寞的可能，换句话说，宗教也促使艺术的产生。作为当时的龕窟、洞窟来说，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还有新疆克孜尔石窟等；无论是菩萨的体量、洞窟石雕的大小、墙上壁画的数量，千佛崖是无法相比的，也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但是，通过难以上青天的蜀道，越过了秦岭山脉而到达的蜀地，并有一块依山傍水、充满祥瑞之气的石壁，开凿成一个能够安下千

尊佛的洞窟，也为甘、陕、蜀地区带来了祈求国泰民安的福地。故而虽小亦精致，韵味、气息俱到。

走过这密匝的洞穴，那种北魏时期的开凿，充分体现了工匠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韧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洞窟中雕凿的佛像、菩萨面容丰腴，端庄、优柔、大气，散发着千年不灭的典雅气息。那些石雕线条流畅、工艺精湛、结构充满了审美。从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二神王到供养菩萨十三尊，每一件都经得起细细品味；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经典。越过了千年，每一个从事艺术者都可以从中汲取为自己所用的养料，不管是什么行当，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演艺等等，都有借鉴之处，切切不可错过。

千佛崖北魏时期的石刻、石雕、壁画，雕刻、绘制者虽然没留下名字，但是作品却大放光彩。一千五百多年前就达到如此水平，叹为观止。如今专门攻学雕塑的人，花十年八年的功夫也得不到这般神韵。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雕凿不出这样经得起推敲的作品呢。或许

是时代、情怀、精神？或许是技术、艺术的断层？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一切，留给我们去思考吧。

朝着栈道拾级而上，我站在最高处举目眺望，嘉陵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一辆列车呼啸而过，江东边的洞窟中的睡佛、弥勒佛、卢舍那佛静静地听着江流的水声、掠过山崖的风声、高铁驶过的呼啸声，默默地等待岁月的流逝。

北魏的石刻、石雕、壁画横空出世，艺术造诣达到了高峰；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后来之人也再达不到其高度。我不由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地悠悠，千年已过，怀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岁月侵蚀、时光流彩，一千多年过去了，千佛崖依然优雅地向远方走去。当年开凿的龕窟，留给我们的精神、灵魂是永恒不变的；抚摸着洞窟风化了了的砂粒，在石缝中寻找组合的趣韵、在细沙中汲取远古的信息。石雕、石刻、壁画赋予的精神、灵魂、艺术，也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